

列航飛畢業後幾十年來一直將心力投放於私校教育，他說這是新亞精神的感召。

「我們進教堂，只可以獲得半天的安慰；我們進了新亞書院，好像重新得到了一個家，整個心靈獲得了寄託和慰藉。」

記者採訪之前，跟很多人一樣，覺得所謂「新亞精神」，應該是由教授老師首先提出的，後來記者發現，最先提出的竟然是學生，然後才由教師表示認同，然後大家加以闡釋擴展。新亞校徽為孔子問道於老子，是由當時學生黃祖植原創，圖書館長沈燕謀建

議修改而成的。當時的學生實際上是難民，隻身一人來港，在港無親無故，所以錢穆說，對這批自中國大陸流亡至港的青年，教授除講授專門知識之外，還要替他們解決生活問題、就業問題、醫藥問題。他們舉目無親、兩手空空、什麼也沒有，老師很自然就成為流亡學生的親人。

回視這一段發生在桂林街的历史，後人一定會驚訝於老師那種不惜一切辦學的傻

多情總被雨

勁，當時錢穆被港大邀請任教，他拒絕了，堅持在月薪不及普通工人的新亞繼續艱苦經營。身為執業大律師的趙冰，一般人以為一定很有錢，不料他臨終時醫藥費也交不了。趙冰理應可以賺大錢，但他不賺，他一生人大部分時間貢獻在義務性質的教育文化事業，別人離婚訴訟，他充當和事佬，有時曉以大義。

新亞書院不叫學院，也不叫新亞大學，而叫書院，是要上溯宋代書院制，體現民間辦學、公開講學精神，教學以人為本，而不是西方學制以課程為本。當我們今天致力發展香港一間國際「一流」大學時，錢穆早就提過，大學規模不必大。如果說大學成了一個家，那麼我們評定一個家是否美好，我們不會說父親一年收入超過多少就是一個好家庭，兒子長大了賺多少錢做到什麼職位就是好家庭。我們看重的是師生關係，看重的是家教，看重的是家教是否對兒女產生氣質的改變。

如果要寫新亞，而寫畢業生或者教授的「豐功偉績」，其實捉錯用神。真正動人的永遠是那些小故事。唐君毅寫信給李天命，說：「棣之敏悟為所罕見自不必說，棣對學校之課程不能照一般規矩隨班聽講亦是小事，所難得者在棣亦不以課程與棣之目前興趣不合而多所責望批評，此是棣之性情純厚處。」從這裏可以看見為什麼唐君毅一直受學生愛戴敬仰，因為他往往只看學生好的一面。

著名學者梁燕城還是中學生時，曾寫一長信給唐君毅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唐君毅即日回信，並約面晤，梁燕城至今對此感念不已。梁燕城在加拿大接受我們長途電話訪問時說：「我還記得他提起了自己的腿踣在地上，他說，你只是看見我的腳不斷踣在地上，但你看不見我其實同時在提起我的腳。」梁燕城後來入讀中大哲學系，期間又試過寫一信給老師唐君毅，述說人生沒有意義，唐君毅雖然每天在校與梁見面，但仍回



錢穆等與一班新亞師生合照



左起：古梅、唐君毅、唐端正、列航飛。攝於桂林街新亞課室。

打風吹去

信給梁，唐君毅說，你有「人生沒有意義」這種想法，為這樣的事情而悲哀，這想法本身十分珍貴，因為在這種想法背後，顯示出你十分渴望人生應該過得有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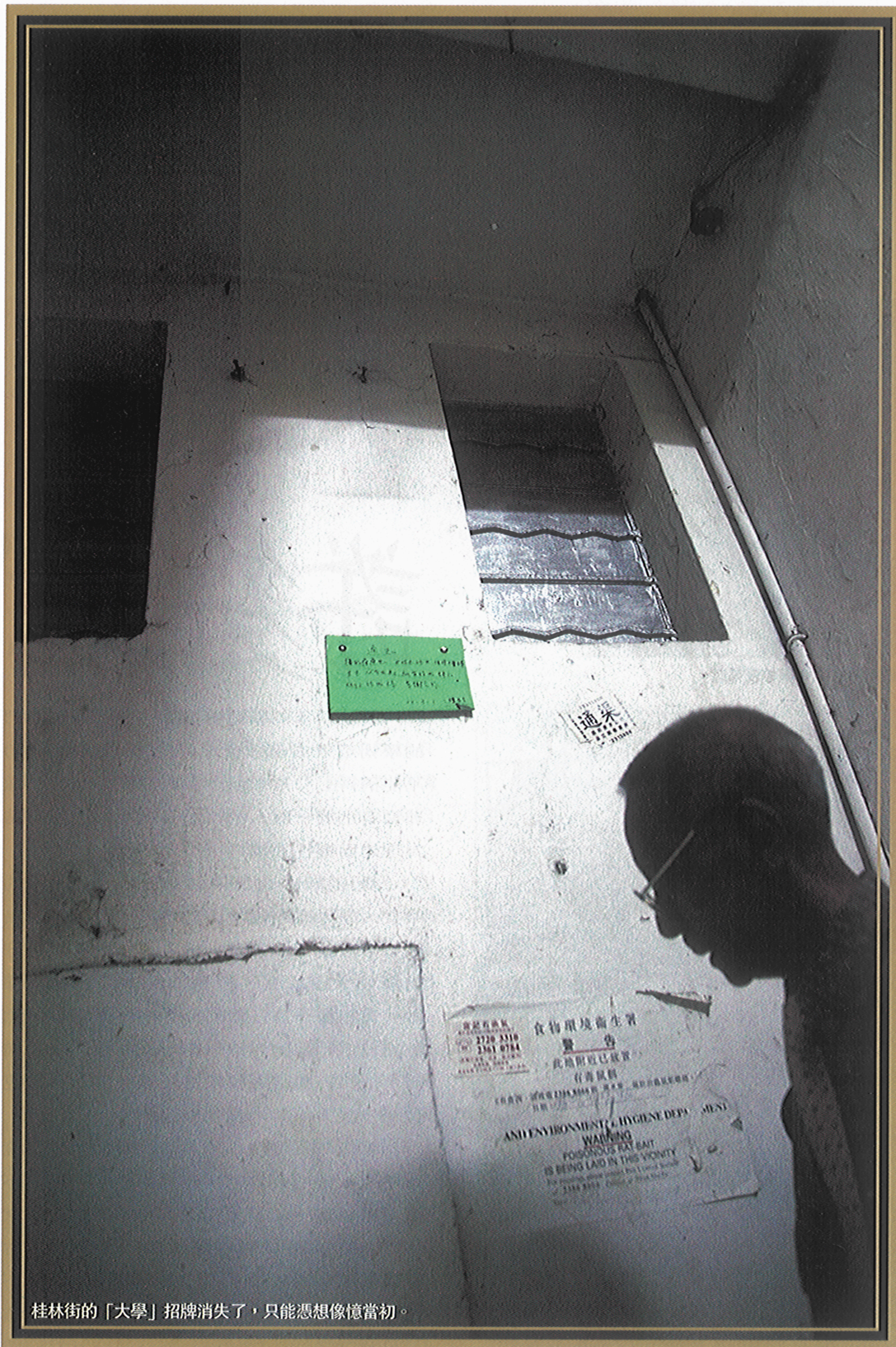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的桂林街的學生常逕自走入唐君毅、張丕介之房間，談天說地，往往不是閒聊，而是論到人生社會國家。同學之間的討論也是如此，常爭論諸子百家、國家民族、文化興亡、政治制度，而爭論得面紅耳熱，旁人不知道，還以為兩人正要大打出手。

辦夜學讓貧童上課

「這批學生充滿蠻勁」，一名調景嶺難民晚上在調景嶺當守衛，大白天就徒步快跑到桂林街上課，每每要跑兩小時以上，傍晚又照樣跑回去當守衛，天天如是。錢穆於心不忍，安插了一分校內工作給他做。其他更多的學生平白受了老師免費教導(因從來沒有學生因交不出學費而被掃出校門)，感恩之餘，決定回饋社會，於是學生自發成立了幾乎免費的新亞夜小學(當年未有九年免費教育)，給附近深水埗碼頭的漁民子弟和街邊擦鞋童教書。列航飛說，當時很多同學，都是白天當學生，晚上當義務教師的。至於招生方法，他們是用毛筆字寫招生告示，貼在街邊招的。

他們又兼職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一九五二年第一期，正是新亞學生余英時任編輯，唐端正、列航飛等亦有參與。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本來着眼於國家命運進行探討，後來成了香港青年思想文化流之園地，發揮很大影響力，那倒是後話了。

這批流亡學生從來沒有想過，讀完四年「大學」課程，將來職業有何保障，也沒有想過怎樣賺錢，他們只是覺得想讀書，想增加學問，至於有什麼用，有沒有學位，港府會不會承認，他們根本沒想過。第一屆畢業生只有兩人，其中一個是余英時，第二屆好像也只有八九人，其實草創期間，整間學校



桂林街的「大學」招牌消失了，只能憑想像憶當初。

學生不過五十人左右。

坊間很多文獻記載新亞教授的事蹟，其實當時學生的事蹟和他們的想法也很值得一記。如果錢穆、唐君毅、張丕介、趙冰等人，為了辦新亞，而充滿着傻氣，那麼，早期的新亞學生也同樣充滿着逆潮流而動的傻氣。當時中華文化經「五四運動」、經共產主義之後，早就成了唐君毅口中的「花果飄零」，但還有很少數的人，跑進來要用文

化、用思想救國，挽狂瀾於既倒。

這種傻氣，初看有點可笑，有點滑稽，細看則有點可敬，但是再細看的話，則會感到有點可悲。可悲的不是他們，而是那個時代國家的命運。有學生回憶說，當年教授背負了太多憂患意識，晚上睡覺往往被噩夢驚醒，學生有時會在深夜聽見老師慘叫一聲：「天啊！」但是到了白天，教授總又回復一臉怡然。



錢穆七九年從台回農圃道新亞參加茶會



左起：牟宗三、徐復觀、唐君毅。新年合照。